

中国环境史研究及其对当代的学术启示 ——对《大象的退却》、《中国环境史》的比较分析和延伸思考

张 琪, 包智明

摘 要: 两部外国学者所作的中国环境史巨著——《大象的退却: 一部中国环境史》和《中国环境史: 从史前到现代》, 于 2014 年、2015 年相继出版中译本, 其学术价值和实用意义都非比寻常。本文在比较探析两部著作在内容、观点和方法层面的异同之余, 认为其对中国环境问题研究具有三方面的启示: 从历史出发的问题面向和价值观, 着眼于两仪关系的研究视角, 以及方法层面的他者关怀和比较意识。据此本文提出, 对当前环境问题应采取多元、动态、自省的研究视角和渐进式共同体治理的实践。

关键词: 中国环境史; 环境问题; 大象的退却

中图分类号: F12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169(2018)01-0075-07

DOI: 10.16493/j.cnki.42-1627/c.2018.01.010

一、环境史及中国环境史研究的两部著作

(一) 环境史: 史学新热点

作为一种新史学的环境史研究最早现于美国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与环境社会学等学科相似, 环境史的诞生也是由于人们逐渐认识到工业社会对自然环境的破坏逐渐危及到人类自身。“环境史”这一术语大致在 1990 年代引入中国。在此之前, 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已经积累了大量近似的研究成果。虽然在是否成为独立学科方面学界仍存在争议, 但并不妨碍这一领域的研究成为“当代中国历史学发展最富有活力的新兴领域”^[1]。包茂宏、王利华和梅雪芹等一些该领域的先驱学者也围绕中国环境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总体来看, 中国环境史研究目前正处于非常开放的状态, 不仅体现在研究内容、学科交叉、理论方法等方面的丰富性和灵活性, 还体现在不断涌现出的外国学者及其优秀著作上, 包括伊懋可 (Mark Elvin)、濮德培 (Peter C. Purdue)、马立博 (Robert B. Marks) 等知名中国史研究者, 以及穆盛博 (Micah Muscolino)、谢健 (Jonathan Schlesinger) 等年轻学者的研究。其中, 已经翻译成中文出版的两部著作——伊懋可的《大象的退却: 一部中国环境史》(以下简称《大象的退却》) 和马立博《中国环境史: 从史前到现代》(以下简称《中国环境史》), 堪称这一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下文将对这两部著作的内容、观点和方法进行比较分析, 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其对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研究的学术启示。

作者简介: 张琪, 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北京 100081); 包智明 (通讯作者), 云南民族大学社会学学科首席教授, 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云南 昆明 650500)

（二）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

《大象的退却》英文版于2006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版于2014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作者伊懋可教授在西方中国研究学界颇具声望。包茂宏教授在评述中对这部著作高度评价，认为“是一部学术力作，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会是经典著作”，是“一部谁也绕不开的著作”^[2]。

《大象的退却》讲述了在“中国”一词所指代的地理区域上所发生的长达4 000年的自然社会历史故事，因为史料丰富程度的限制，重点集中在帝制晚期。这部著作的主要内容包括模式、特例和观念三篇：第一篇《模式》旨在揭示总体图景，首先界定了时空范围，然后分别讨论了大象南撤、森林破坏、战争对环境的影响，以及水利系统建设和维持问题，通过纵论主要的结构性环境要素，勾勒出中国自然环境、历史地理层面的长时段变迁的大幅图景，如沧海桑田般的环境退化；第二篇《特例》是对浙江嘉兴、贵州苗族原居地和河北遵化三个典型地区的个案研究，立体呈现了三个截然不同的区域环境史，并关注社区、家庭农场、庄园、宗教机构等小型社会组织的发展对自然环境产生的影响，是基于上一部分总体图景描述而对局域的细化和强化，体现出浓厚的经济—社会史色彩；第三篇《观念》考察了中国社会历史中与自然环境有关的观念、情感、知识、思想、信条等，上升到了文化层面，分别从感性/理性、个体/组织的角度尝试讨论这片土地上的环境变迁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

（三）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

《中国环境史》英文版于2011年由Roman & Littlefield出版社出版，中文版于2015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被誉为“实为中国环境史的通史”、“可望成为美国大学里有关中国环境史的主要参考书”^{[3](P151)}。其作者马立博教授在此之前的另一部中国环境史著作《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英文版1998，中文版2010），被誉为“堪称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区域环境史的典范”^{[3](P151)}。

《中国环境史》是第一部贯穿从北京猿人到当代中国的整个历史、描述中国人与自然环境互动关系的长时段史学著作。这部著作大致遵循编年体例，以时段分章，脉络及内容十分清晰。除首尾的前言和结论外，第二章讲述了公元前1 000年前农业产生阶段的自然环境与人类聚落状况；第三章考察了公元前1 000年至公元300年间的上古及帝制早期的环境变迁，表现为伴随着国家扩张和农业扩张而迅速减少的原始森林；第四章探讨了公元300年—1 300年帝制中期南部及中部地区以水稻为主的农业拓殖带来的环境改变，及其与华北地区森林退化的对比；第五章关注了公元1 300年—1 800年帝制晚期的边疆、岛屿和发达边缘区，周边的开发暗示着接近生态极限；第六章则是农业资源耗竭和帝国生态极限到来，表现为公元1800年至1949年近代中国环境的严重退化；第七章介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伴随工业发展而来的环境问题及其治理。除了展现中国环境变迁的历史进程外，这部著作还在各章节深入讨论了该时段下的典型课题，如青铜技术、自然理念、水利工程、边疆开拓、环保问题等。

二、内容、观点与方法的对比分析

由于中国的地域辽阔、历史渊长，直接以宏大的整体“中国环境史”作为研究主题的情况为数寥寥，而纵览西方学者对中国环境的史学研究成果，大多数为限定在某一局域或某一时段的专题性研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象的退却》和《中国环境史》这两部学术著作（以下简称“两书”）则具有非常的气魄。面对同样的中国环境变迁研究，一方面，两书在内容、观点和研究方法上的相通与不同都值得进行比较研究；另一方面，在比较性的辨析中，也产生了对当前中国环境问题的研究

的学术启示和延伸思考。

(一) 内容对比: 不同维度的点面结合

从著述内容上来看, 两书都进行了点与面的结合, 既向读者呈现出了中国环境史的整体图景, 又对具体问题进行了探究与分析。差异之处在于, 《大象的退却》更注重由点到面的推及, 如以大象南撤、森林消失的具体实例来证实中国环境的退化性变迁, 选择战争、水利工程两个主要社会变量分析人类社会对环境变迁的影响; 《中国环境史》的叙事方式为由面到点, 这首先体现在以编年体例对中国环境变迁的各阶段历史进行概括性介绍, 考察的内容涉及森林退化、物种减少、气候变化、沙漠化、河流问题、人口、农业、移民、战争、疾病、能源、市场、技术、思想等诸多方面。同时, 在各阶段中作者对具有重要意义的事项进行了专门分析, 如帝制早期的环境意识、帝制中期的农业技术和水利工程等、帝制晚期的边疆开拓、近当代时期的环境危机和环境治理, 等等。这些专项分析深化了读者在“通史”基础上的认知。

此外, 两书使用的文献材料都十分丰富, 但对中外文献的侧重程度存在差异。《大象的退却》远远超出了一般历史著述的范畴, 使用了中国历史、哲学、政治、经济、自然、科技、文化、神话、思想等领域的各种类型文献, 同时也因为引用和翻译的中文文献之多、贡献之大而获得中外学者一致赞叹; 《中国环境史》是建立在对大量西方文献旁征博引的基础之上的, 其中不乏对近十年来相关新文献作品的使用, 全书引用注记多达 1 071 条, 书后所列主要参考书目 200 余本, 但绝大多数为非中文的参考文献。

(二) 观点对比: 三千年不可持续与农耕社会单一化

《大象的退却》在梳理和解读客观史料后分析认为, 大象退却的历史表象反映出人象之间的“长期战争”。具体表现为: 人们为了扩大定居农业以及其他木材需求而不断毁掉森林(大象的生存环境); 政治、军事、市场等因素通过灵活作用于分散单位的定居农业而促使自然环境退化的情形不断加剧; 虽然有时技术革新可以缓解人类和自然之间的矛盾, 如水利工程、肥料循环等, 但是由于技术闭锁和回报递减等原因, 最终社会发展还是面临着三千年的不可持续; 而中国文化中对自然的感知(环境意识)与实际生活(环境行动)是割裂的, 也不存在单一的自然观。《中国环境史》虽然具有通史性质, 但仍明显地表达出作者观点: 不赞同把中国环境史仅仅描述成数千年人与野生动物的战争史, 而是认为中国的环境史是一个环境、人类和社会制度不断趋于单一化的故事。具体来看, 中国人成功建立了一种农业耕作和政府战略利益之间的特殊结合, 从而造成了范围大、间断性和长期性的生态破坏, 如汉朝开创并被后世一直沿用的屯田政策。虽然中国历史上很早出现过类似环保的思想, 但与人口、经济和政治等物质因素相比, 它们并没有发挥什么实际作用。

两书都跳出了经济进步导致环境退化的简单因果逻辑或线性关系, 而认为导致中国环境变迁的因素是复杂的。在整体观点的表述上, 两书的差异在于: 《大象的退却》认为, 与众不同的起伏明显的中国式“前现代经济增长”逐渐支配了环境的转变; 《中国环境史》的结论为, 中国环境史最重要的趋势是自然生态系统被简化成一种特定的农业生态系统, 且从至少 2 500 年前开始就不断自我复制。在对环境变迁原因的归结上, 伊懋可教授表示: “我怀疑, 正是小单位的主动精神(反映了某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几乎不受限制的任意组合的结合(要么以行政要么以商业为基础), 引起了对环境的彻底开发, 这在前现代世界是独树一帜的”^{[4](序10)}; 马立博教授则认为主要是汉人农业耕作和政府战略利益之间的成功结合改变了环境。

此外, 在一些更具体的方面两书也存在着差异。《大象的退却》的史段终点基本止于帝制晚期, 其结语初步认定, “帝制晚期中国生产体系对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压力’至少比大约近代之初的法国明显要大”, 并且, “传统技术所能利用的资源已接近被完全开发的地步”, “一系列原因往往大大延缓了中国人应对农业经济现代化挑战的速度”^{[4](P479)}。《中国环境史》延伸到了对近现代中国环境

的探讨，其结语更倾向于落到马立博教授所言的“中国历史中的一个悖论”上——“虽然环境的退化是长期而且明显的，但中国的农作制度确实具有着非凡的可持续性”^{[5](P446)}，尽管他对中国未来的环境压力仍然是无比担忧的。在对历史环境意识的判断上，伊懋可教授通过对古代文献的分析认为，虽然中国古人常寓情于景，但并不存在将环境作为对象来进行保护的社会思想或意识，在主宰社会运行的帝国信条中自然事物甚至被有意视为工具；马立博教授认为，中国人对自然的看法是复杂多变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观念总是人们在遭遇环境困难时产生的一种反思”^{[5](P342)}。需要指出的是，相对于两书的丰富性、厚重性，以及中国环境变迁历史机制的复杂性而言，本文仅从两个具体微小的方面进行，旨在体现西方不同学者在中国环境史这一相同主题下的研究结果并不相同。

（三）面向宏大复杂课题的综合与比较方法

两书中文版的序言均为王利华教授所作。他认为两书“属于两个不同体例和风格的著述，两者各有建树”。作为老一代西方中国学界之翘楚和西方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开拓者，伊懋可教授在提出问题、解读史料等方面或许更显功力，《大象的退却》一书的专题研究性质允许他可以更自由、恣意地展开叙事和论说；马立博教授的这部著作，则因具有“通史”性质，乃不得不在遵循中国历史时间表的前提下，渐次展开自然与社会互动的空间过程，所牵连的历史现象和问题远为广泛而且复杂^{[5](序2)}。

两书在跨学科和比较研究两种方法的具体使用上有所不同。比较而言，《大象的退却》的跨学科性更突出一些，自然科学、工程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内容更加丰富；《中国环境史》也使用了跨学科的资料和方法，但其原本的人文学科属性更加浓厚。两书在揭示历史变迁和中西差异上都进行了宏观层面的比较分析，但《中国环境史》在中国整体地理范畴下对南方、北方、边疆等不同地域的比较，对汉族和非汉族群的比较，以及纳入更晚近时段——1949年至今等方面，其内容更加丰富。

虽然针对中国环境史这样宏大复杂的课题，两书都成功运用了整体与专题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但在具体策略上有明显差异。《大象的退却》以具体现象切入，从大象南撤引出森林滥伐、军事政治、农业水利、思想文化等相关的专项分析，从而建构起整体的中国前现代环境史；接着通过对三个精心选择的地区进行全方位、立体化的案例分析，夯实了前面的概括描述和逻辑推理。《中国环境史》以整体化覆盖为纲，呈现出了清晰的史学脉络，在不同时段选择不同事项进行重点专项分析，从而深化了对研究问题的认知和解释；相比之下，由于注重对某种整体规律的宏观推论，《中国环境史》在深度及论证力度上相对欠缺，容易受到所用文献的观点倾向的影响，“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套用西方殖民主义的话语体系来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和汉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5](译2)}。

三、对于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的启示

英文版《大象的退却》（2006年）的出版时间早于《中国环境史》（2011年）五年，但两书中文版的出版时间仅相隔一年（2014年与2015年）。这反映出了一个事实：“中国环境不断恶化的现实迫切要求学术研究提供必要而最新的治理知识”^[6]。本文认为尤其是在研究关怀、研究落点和研究方法三个层面，两书对于中国环境问题的研究具有价值观、视角、方法等方面的重要启示与参考价值。

（一）从历史出发的问题面向和价值观

与主要关注人类政治、经济活动的政治史、经济史和农业史等赞赏农业对人类社会的积极贡献不同，环境史的出发点和学科关怀是自然和生态的变迁，并倾向于认为人口增长及其农业扩张逐渐毁灭了自然生态环境的多样性。这种观点和角度对于将环境问题的“原罪”习惯性地简单推定给工业社会的研究者或对农业社会存有朴素追怀之情的研究者来说，无疑具有惊醒意义。这两部环境史

著作对中国的环境问题研究至少具有两点重要启示: 其一, 中国人与其所处的环境之间或许存在某种一般规律, 但或许也存在着更为复杂的情况, 要警惕任何先验性的关系预设; 其二, 在不同的历史时段或者不同的地域, 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状态并不总是相同, 同时也存在着时空的相对意义。

除了史学价值, 两书还在价值观层面给人以启发。伊懋可教授在检思自己所秉持环境价值观时使用了“野生的进步的和谐”一词, 并引用《沙乡的沉思》片段表达了对已经逝去或行将失去的“荒野”(Wildlife)的珍视。马立博教授一边感慨中国耕作能力之强大, 一边直接表白了对中国长期以来环境退化及过去 30 年环境污染造成对自然环境不可逆转损害的担心。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具有不可分割性, “皮之不存, 毛将焉附”? 就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而言, 如果没有面向环境这一课题的讨论, 如果不运用一种同情的、共情的价值关切, 就不太可能对人类社会自身做出完整或彻底的理解。

(二) 环境问题的“两仪关系”视角

环境史研究关注人类与自然在历史时段里的互动。这一互动的典型表现是人类社会的生计活动对自然生态的影响以及后者的反应。这一互动的最终结果是环境的变迁。这里存在着三组概念: 自然与人类、环境与社会、生态与生计, 两两之间既是对立存在也是相互联系的。本文仿照中国古人自然哲学思想中的“阴阳”说将其称作“两仪关系”(取自“太极生两仪”)。“环境”概念的中文内涵为周围之场所和景物, 具有以人为中心的隐喻; 概念外延既可指自然构成的环境, 也包括人工制造的环境, 因而并不等同于“自然”的概念意指。“社会”与“环境”相对, 一方面是明示了人的组织性存在而非自然生物个体; 另一方面, 对环境而言则是依存和改变的关系。简言之, 环境史抑或当下环境问题研究, 都不能将自然与人类、环境与社会、生态与生计看作分离性的对立存在, 而应以两仪关系为根本出发点对社会行为和环境改变问题予以探究。

两部中国环境史著作在描述自然生态系统的历史变化的同时, 密切结合中国人尤其是汉人族群改变自然的主要活动(即生计方式)——农业, 展开了涉及组织、政治、军事、市场、文化等其他因素的综合分析, 最终展现了一幅中国地域之上的“大环境”变迁图像。这种研究实践体现出了对自然与人类、环境与社会、生态与生计两两关系和双方互动的格外重视, 是绝大多数其他类型研究所不具备的。对于当下中国环境问题研究来说, 有两点具体的参考与启发: 一是可以将生计方式(即人如何从环境中汲取所需物质与能量)作为基本切入点, 来联系起环境与社会两个层面, 进而展开更多涉及性别、阶层、组织等社会要素的研究; 二是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 环境不仅仅作为人类社会的资源和能量的来源, 逐渐更多地体现出生活空间/场景的意义和价值, 甚至融入到了心理、身份、政治、文化中成为要素之一, 环境与社会互动水平超越了生计层面, 两仪关系更加丰富, 因而相关研究在这一方向上具有更多开放空间。

(三) 通达彼岸: 他者关怀和比较视野

作为外国学者对中国环境历史的研究, 两书不约而同地把中西方比较纳入其中, 体现出一种“他者”关怀及比较研究意识。例如,《大象的退却》利用既熟悉中国某些地区也熟悉欧洲部分地区的传教士资料对中欧两个经济体的农业核心区的环境压力进行了比较, 认为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农业在土地利用上比欧洲农业要密集得多; 同时该书在对谢肇淛所著《五杂俎》的研究中, 认为其具有原始科学性质, 并将之与欧洲科学研究中的“客观存在”、“规划”、“实验”、“逻辑”等进行了比较分析。《中国环境史》除了将中国环境史置于世界史背景中加以考察外, 还特别重视汉人与其他族群之间的历史生态关系, 并以较多篇幅讲述了汉人与众多其他族群在生计体系、资源利用方式等方面的差异, 认为屯田政策就是通过政府保护和家庭农场共同把边疆陌生的自然环境转变为定居农业, 从而令中国辽阔大地上多样性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最终慢慢走向单一。无论是前者对于中西差异的形而上的假设和追索, 还是后者带有一定“殖民主义”色彩的族群汉化结论, 都反映出两者

对于他者社会与文化的在地化理解，而非以我为中心的懒人推定式解释。

无论人类个体还是社会，自我与他者始终相生相伴，对于两者及其之间相互关系的认知和处理是永恒的课题。对汉族来说，其他族群是他者；对中国来说，西方是他者；对人类来说，环境是他者。处理好相互关系的前提是理解他者，理解他者的前提是具备他者关怀或他者意识。在环境问题全球化的背景下，无论对于中国范围以外的他者还是以内的他者，生活在这个区域的人类集体都需要唤醒或者更新其他者意识。而在相关领域的研究中，包括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在涉及环境课题的分支学科中，尤其要建立起普遍的他者关怀。美国历史学家濮德培（Peter C. Purdue）表示，进入 20 世纪，其他国家对中国产生的重要影响使得我们应该注意外国势力和外国资源对中国环境的影响。同时他也注意到，几位年轻学者却把眼光放得更远，讨论跨越中国传统边界的边疆区域，这里的文化形式纷繁复杂^[7]。由此，在意识层面的他者关怀和实操层面的比较视野是两部著作给予中国环境问题研究的又一重要启示。

四、对中国环境问题的延伸思考

鲜明的问题意识和真切的现实关怀使两部环境史著作对中国环境问题研究者来说具有与众不同的吸引力。两书在对自然退化的历史变迁进行辨析时所提出的具体问题，如为什么森林砍伐是大规模、持续性和无限制的？水利工程的短期效益和长期挑战与哪些社会政治因素相关？定居农业生计与国家政治军事之间如何协调一致和相互强化？各地的差异性以及向边疆不断拓殖对环境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人们的朴素情感、环境意识与实践行为之间存在着怎样的矛盾等？我们可将这一系列问题延伸到对当前中国一系列工业污染问题的思考与研究上来，如为什么环境污染是普遍的、蔓延的和难消除的？高污染风险的化工行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与哪些社会政治因素相关？现代化进程与国家/国际政治之间如何协调一致和相互强化？城乡二元性以及“工业（污染）下乡”趋势对环境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环境宣传、环境意识、环保行为、环境抗争之间存在怎样的相关关系等。虽然这些问题的提出不免带有建构论色彩，但其学术层面及实用层面的价值意义都值得肯定。

任何简单化判定与处理环境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做法都属于冒险行为。在当前的环境治理中，既要充分认识到过度开发、工业污染等环境问题对于人类社会存续的严重影响，纠正过去几十年来在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两方面的严重失衡，同时也要特别注意矫枉过正的风险，避免环境治理行为的失范甚至异化而对经济与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害。此外，虽然科学技术的发展提高了人类对环境的认知与控制水平，对于环境保护具有不可轻视的价值，但仍然要谨防陷入科技决定论的极端现代化黑洞，必须在保护环境客观存在的同时保护环境之于人类的社会价值和文化意义。总的来说，无论是在环境问题的学术性或应用性研究中，还是在具体的环境保护实践中，保持多元、动态、自省的开放性视角是非常重要的。

浅论中国环境问题的存在、环境治理的陷阱之后，回到环境治理的主体，即“环境与社会”这组概念关系中的“社会”这一“出发点”和“主动者”上来。“出发点”意指将人类行为是环境问题的起点，“主动者”意指相对于环境被动性的人类主动性特征。在作为主体实施环境治理行为时，“社会”的概念更适合用“共同体”概念予以表达。“共同体治理”体现为可以包含和融通公、私两个领域的人类共同体（抽象意义），以及国家、族群、组织、社区、家庭等各层级共同体（实在意义）的综合治理实践。在当前中国社会，对环境问题开展共同体治理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问题解决也非朝夕可盼，但政府治理引导下渐进的“共同体治理”或可成为“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最佳实现路径。

参考文献

- [1] 杨文春. 近年来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以若干学理探讨为中心[J]. 鄱阳湖学刊, 2006(2).
- [2] 包茂宏. 解释中国历史的新思维: 环境史——评述伊懋可教授的新著《象之退隐: 中国环境史》[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4(3).
- [3] 韩昭庆. 万花筒视角下的中国环境史——《中国的环境和历史》书评[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13(4).
- [4] 伊懋可. 大象的退却: 一部中国环境史[M]. 梅雪芹, 毛利霞, 王玉山,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4.
- [5] 马立博. 中国环境史: 从史前到现代[M]. 关永强, 高丽杰,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 [6] 梅雪芹. 中国环境史的兴起和学术渊源问题[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2).
- [7] 濮德培. 中国环境史研究现状及趋势[J]. 江汉论坛, 2014(5).

Study of China's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Its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d “China: Environmental History”

ZHANG Qi, BAO Zhi-ming

Abstract: “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and “China: Its Environmental History” written by foreign scholars and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in 2014 and 2015 are extraordinary both in academic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books in terms of contents, opinions and methods, and points out that there are three aspects of enlightenment for the study of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China: issue orientation and values considering the history, focusing on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the alterity and comparison in methodology. And thus a pluralistic, dynamic and introspective research perspective, as well as some progressive community-governance practices are recommended for the current environmental problems.

Key words: China's environmental history; environmental issue; 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责任编辑 刘传红)